

# 2022花地文学榜 年度盛典

## 王家新：写“存在之诗”，接受生命不息的冲刷



不需要什么“平衡”做彻底的思想者

羊城晚报：作为您四十年心路历程的形象凝结与诗艺呈现，最新诗集《未来的记忆》于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何意义？

王家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我的写作的确有四十来年了。如果从写作时间来看，不仅我个人，我们这代诗人大概是写作时间最持久的一代人，北岛、多多他们都还在写。

这在文学史上的确是很罕见的。对一个诗人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突然失去或渐渐失去创作的功力。

我很早就认定诗歌是一条远路，用一生也无法完成。所以我很赞同奥登所说的“大诗人是一个持续成熟的过程”。

虽然我不太爱用“大诗人”这个说法，我只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可信赖的诗人（这是我判断一个诗人的标准）。

这部诗选的最后首是《在洞头》，诗中我引用了张枣的一句话：“既然生活失败了，诗歌为什么要成功呢？”而全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流泪，听着大海的冲刷声。”这就是我对自己或我们这代人的某种“总结”。

失败，的确，甚至是惨败，但何谓“成功”呢？不管怎么说，我的写作，就是要把自己带到某种更伟大、也许更无情

的生命存在面前，并去接受它那不息的“冲刷声”。

羊城晚报：创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诗意”与“哲思”之间的关系？

王家新：在一个贫乏的文化环境下，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能带来某种思想性和精神性，带来某种“思”的可能性。但这和那种老套的“哲理诗”不一样，对此你看得很清楚。

这么说吧，我希望我的诗能够成为“存在之诗”，而不只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映或情绪的抒发。这种“存在之诗”必然包含了对于世界、对我们自身存在的洞察力。这种“存在之诗”本身就是一种贯穿性的诗性，它不只是几句格言。它和诗的血肉也不可分离。

所以，不需要做什么“平衡”。一个诗人要做的，是彻底的思想者。

羊城晚报：您写诗的初衷和理由是什么？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创作？

王家新：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可能在少年时代就解决了。记得我还在上初中时，一个上过省卫校的阿姨看到我那样痴迷于读书后很吃惊：“你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是要吃苦的！”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虽然我对一切还懵懵懂懂。但我知道我注定会属于文学，会献身于它，而无论它给我带来什么。

所以，不必再问诗的位置和意义。它是我存在的理由。我不坚持也得坚持。这就像多多有一次对我说的：“是你翻译策兰吗，是策兰要你翻译他！”

力求对时代进行更普遍的“揭示”

羊城晚报：中国现代新诗

发展现状如何？今天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和呈现有进一步加深吗？

王家新：其实，在今天，我们对“诗意”的理解和呈现更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因为荒诞无名、变化多端的现实对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新的巨大的挑战。

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访谈中我曾说“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真正有所揭示，不能写到它的痛处、难处和晦暗不明处，我们就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无法交代”。

且不说疫情时期我所写下的诗，今年俄乌冲突以来，我也写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战时见闻录》这两组诗。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一生还会写战争诗，当然，我们自己并不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只是通过“战时见闻”，力求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进行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揭示”。

羊城晚报：诗歌在这个时代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一个诗人又该如何通过诗歌去书写这个时代？

王家新：这几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残酷战争，迫使诗人的创作面临着要求和挑战。诗歌不能说“繁荣发展”，但诗人们并没有少写。乌克兰的雪下在成千上万人逃难的路上，也下在诗歌的掩体里。时代最迫切的主题又再次转向了灾难、见证、焦虑、拯救与希望。

中西诗学的融合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羊城晚报：您一直积极致力于现代诗学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在您看来，中国现代新诗的

发展与传统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家新：几千年的古典诗歌对我们从来都很重要，哪怕它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近年来我除了写一些与陈子昂、杜甫、苏轼对话的诗外，我也研究西方诗人对他们的翻译。我还写有《作为“同时代人”的杜甫》一文，试图让他重新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至于古典诗歌对当下诗歌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我还建议人们去看看昌耀、西川、欧阳江河、陈先发、胡弦等人的创作，他们比我做了更多有益的尝试。他们各有各的方式，但都在“致力于现代诗学多种可能性的探索”。

羊城晚报：西方现代诗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王家新：西方现代诗曾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如果离开了奥登的影响，穆旦就不会成其为穆旦。

这种影响在今天依旧存在，比如说策兰之于多多，之于广东的一个优秀诗人林丽筠。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她就策兰的诗和翻译给我的一封信。看她近些年来让人不无惊异的诗，我想她已完全无愧于这种影响了。

这里我还要说，这种关系早已不是那种被动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而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相互寻找、对话、交流的关系，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的互译和互文关系。

至于如何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这会是一种长期的、艰巨的诗学努力。近些年来，我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纳入我们的传统文脉（如组诗《旁注之诗：秋兴》等），我的写

作也一直着重意象、情境、细节、“留白”这种古典传统。但西方诗歌那种诡异的心智运作、差异性视力和反讽技艺对我仍十分重要。

让写作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

羊城晚报：该如何提升诗人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自觉，从而保持诗歌内在的深度和精神质量？

王家新：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诗的价值也是一种语言的锤炼和技艺，更要在诗学问题的核心。这里不谈理论，最起码，诗人应努力抵御普遍的语言惰性。没有人能忍受对语言的敷衍。

目前我更注重语言的新鲜感、独特性、穿透力和锐利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想诗的语言不仅要有“功”（讲究语言的锤炼和技艺），更要有“神”。一个诗人梦想的，就是他的语言能入诗，最终能够进入到一种神入化的境地。

羊城晚报：一首好诗有哪些标准？

王家新：写诗当然是有标准的，我在一个地方也说过，“写诗不仅是一种辨认，还应是对这种辨认的确立和坚持；让它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可能，这就是我在这几十年里所做的工作。当然，这很难，尤其是在一个基本上丧失了“审美判断力”的年代。

然而又必须去做，又必须达到一种更高的肯定，不然我们的写作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在以上提到了“可信赖的诗人”，只有那种在文化的混乱甚至敌视中，一直体现了这种良知、这种语言的尺度的诗人，才称得上是这种诗人。



王家新，1957年6月出生于湖北丹江口，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诗论随笔集、译诗集等数十种

致敬词

感言

王家新《未来的记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以诗进入当下，以诗写下“未来的记忆”，分明显示出作者的一份自信，相信这些承载着四十年情感记忆的诗歌，一定会穿越现在，抵达未来。

自然朴素的言语姿态、从容舒缓的抒情调式、熟稔机智的深度叙述，多种修辞手法的挥洒，同丰满的意象、深沉的思辨遇合，抵达内敛蕴藉的风格境界，直击读者心灵。其“崇高”的伦理坚守与技术打磨，对重建当下诗歌写作具有特殊的启迪。

为抵达现实的荒野而写作

很高兴参加这次花地文学榜在深圳的文学活动，也非常感谢这次花地文学榜将诗歌奖授予我，我想这对我创作会是一个重要的激励。

这次我获奖的诗集叫《未来的记忆》。曾经有读者问我，未来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是从未来往回看我们的一生吗？或者是我们提前把未来过了一遍吗？不管怎么说，诗人是在语言中重塑时空的人，甚至可以说诗人是为未来而生的人，因为诗是苦难中的梦想，是希望，是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对当下的审视和召唤。

如果问，我的写作体现了什么，我想它体现了一种在场的诗群。我认为我的写作能够不断地抵达诗人们所说的“无力经历的当下”，我们一定要经历当下。无论我的写作是什么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抵达现实的荒野。

这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们所写的当下不仅变化多端、荒诞无

力，而且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面对未来，也就是面对当下的挑战。作为一个诗人，我深感无力而惭愧，但诗人应该要把握这个时代，深入其中，需要把握它的疼处、难处，这样我们才能如阿甘本所说的，“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诗人还应该更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下把握自己的写作，他不仅是时代之子，还应是文明之子、宇宙之子，还应穿过全部的历史，“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

同样，这样的写作还体现了一种空间思绪，无论远与近、有与无，大海的召唤与城市的喧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并存于一个永恒的当下。我以为，一个诗人把握了这样的当下，他的写作也就指向了未来。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林园）

# 2022花地文学榜 年度盛典

## 林岗：散文恰好能满足当代人对精神创造力的追求



作作者的“怀旧”：证明自己在思想上曾年轻过

羊城晚报：您从历届花地文学榜的终评委，到本次成为年度散文作家得主，感受如何？

林岗：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在我的心目中，奖项是有两类的：一类是争得来的，另一类是从天而降的。你们的奖对我来说是从天而降的，令人欣喜。

羊城晚报：关于本次获奖的《漫识手记》，您写作的契机和动机是什么？这些发表了或未发表的思想，在您的学术、文化评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林岗：我在高校里教书。我认为学术思考需要从基本问题开始，从根本处下手。这些问题未必讲得能马上联系到手头正在做的研究，未必有近在眼前的助益，但长远看肯定是有帮助的。日积月累的阅读和思考，也可以看作是学术本能的“副产品”吧。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字出版。如今这本书所收录的，就是我头脑比较活跃的岁月所思所想的问题，最后形成文字。这便是本书的初衷。体例上则效仿了前人的方式——比如古罗马皇

帝马可·奥勒留，就有著作《沉思录》传世，记下他在带兵打仗期间，对人生的思考、格言和信条；弗兰西斯·培根的《沉思录》也是这种体例的著作，影响深远。

羊城晚报：古人有“悔其少作”之说。回看这些曾束之高阁十余年的文字，会不会让您触景生情？

林岗：确实有一点触景生情，毕竟年纪大了。要说这些文字对我自己的意义，就是自己人生的一段。有时候回过头来翻看一下，自己挺感慨的：人生经历过这么一个活跃的阶段，思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我想这也挺好的，一个人在某个时段应该是那个时段的样子，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这就是人生。

这些文字至少可以证明，自己在思想上曾年轻过。具体打开书看看，就知道这是出自一个看起来有点老成、其实还是很有点青春的，那么一个人之手。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迹象：或许不知道路在哪里，但也不知道哪个结论是对的，但当时很清楚自己处在哪个点上，知道自己就这样认识问题。

散文家的传统：追求表达在前，选择修辞和文体在后

羊城晚报：从《漫识手记》的体例上看，有前贤的“随想录”“冥思录”“箴言录”传统在前。

林岗：这种片段式的写作还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巴金《随想录》这种文体更多是西方带来的。

其实很难说什么是散文的固定格式。我们对于一个

文体的认识，总是要在足够多的样本出现之后，才能够归纳出来。在这个方面还是开明一点比较好。就像苏东坡所讲的，文无定法。文体也无定体。文学的第一义是表达作者想表达所感所思。追求表达在前，选择修辞和文体在后。

对于散文，目前辩论很多。如果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可以不管这些辩论，根本不必担心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散文。就像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标题，只是记录了某段文字、某段思考的日期，但后来用于出版，这些日期就不重要了，于是才有了标题。

羊城晚报：越来越多学者、小说家、诗人加入到散文写作、出版中。散文何以容易成为焦点？

林岗：新文学运动给散文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也将西方的好作品介绍到中国。今天中国的好散文写作这个活跃，有这么多人写，这是秉承了中国文学强大的传统，并将其在当代发扬光大了。

诗人要对语言有触电般的感受，小说家要有超越常人的讲故事的技巧。这是要靠天赋的，但散文并不需要诗或小说那样高的天赋，更多地通过后天的勤奋的训练、阅读和学习就可以做得不错。文从字顺，高中程度足矣，剩下的见识、修辞等靠作者自己了。所以许多人加入散文的队伍，并不奇怪。再者，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物质生产大发展自然催生了对精神活动的渴望。散文恰好就是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创造力追求的文体。

评论家的忧虑：受众的文学鉴赏力随时间衰退

羊城晚报：在人工智能来势汹汹的当下，写作受到怎样的影响？

林岗：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写诗，应该有一天也能写小说。在未来，很可能不仅有人类的文集，人工智能也会有文集出版问世。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人的文学趣味也是变迁的。说不定人的文学鉴赏趣味存在向人工智能靠拢的可能性。我们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这个广泛使用机器人和人工产品的社会和时代改造了。每当回看古代佳作，我深有感触：当代人感官的感知力和敏感度已经变得远不及古人，不及古人那么敏感、细腻。我们对事物的细微处、对情感反应的敏感度都在衰退，感官比古人迟钝，情感比古人毛糙，于是文学的鉴赏力也随之衰退。

是好在坏姑且不论，这种衰退的表征之一，便是那些曾经被推崇的经典在年轻人那里得不到回响了。

羊城晚报：其实，新的经典或许是在不断产生的？

林岗：是的。塑造经典的最终力量其实是读者，而不是专家。这里的读者不意味着当时活着的那一代人，也包括更多尚未出生的读者。他们不是今天的读者，却是明天的读者。

有些作品在它问世的时代不流行，甚至被它的时代所反对，但最终证明的却是时代的鉴赏出现了偏差。不是作品有问题，而是那一代读者有问题。所以作为作者，不妨固执一点，不妨一意孤行一点，不妨我行我素一点，总之要硬

固、要我执，不必讨好市场，不必讨好与自己同处一时代的人。这个年头缺少读者，不等于将来的年头也缺少读者。读者是生生不已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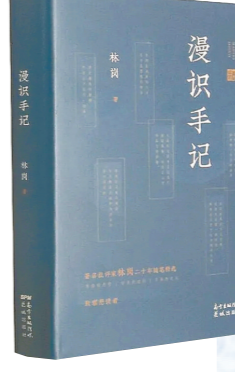
学者的省思：光摇笔杆子，那只是“作家”不算作家

羊城晚报：您的教学、研究、社会活动与写作的时间如何分配？

林岗：其实我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笑）。当初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一开始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但后来我发现，社会活动能够提供途径，让我从不一样的角度了解社会。益处就是让自己的思考不无的放矢，不闭门造车。这实际上是反哺了学术的思考和写作。要是只有校园生涯，只在写学校教书，当然就无从知晓今天的基层文艺活跃到什么程度。大学校园里有时，乡镇基层也有诗。许多乡镇文艺工作者对诗的热情，一点也不比大学教授差。

羊城晚报：有往届的花地文学榜得主认为，当今的写作者都应该成为学者型的作家。作为学者，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林岗：依我的理解，他的看法无非是一个好的作者应该多读书。语体普及以后，文学的门槛就不高了。入门容易做好难。没有大量阅读的滋润，不虚心向前辈典范学习，操起笔就写将过来，就算有文才，也容易江郎才尽，无以为继。作者多读书，一边写，一边读，让自己丰富起来，这样才能走得远。光摇笔杆子，那只是“作家”，不算作家。



林岗，1957年生，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传统与中国》《罪与文学》《泰征南越论稿》等

致敬词

感言

林岗《漫识手记》花城出版社2021年3月

漫谈而卓有识见，手记而自成文体。282则断章随笔，20年来持续的思考，叩问自我与世界，纵情于对伦理信仰、社会历史及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倘若一个思想者在词语密林中的精神漫游。

散文的本质是任心自在，《漫识手记》是很好的诠释。用“漫笔”的形式编织，尽显一派从容、浪漫与生机盎然，让我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拥有难得的参照，又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散文精神。

从1986年开始，老作家、曾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曾提出，应该有一个“岭南文派”。后面，隔几年广东文坛就有新的旗帜树立起来，名称有变化，比如叫“新南方文学”“珠江文派”“珠江文明”，包括现在流行的“粤派批评”，都反映了这片土地的新变化。

现在广东文坛还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我希望作家们能够慢慢沉淀下来，从这种变化中捕捉到写作的新定位。广东现在在全国各地、拥有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作家，大家把自己的文学元素带到新的土地上来，又在这里上升为文学的新路径。我想大湾区的文学前景，大概就是各地文化的融合、沉淀、再创造。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陈晓楠）

访谈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